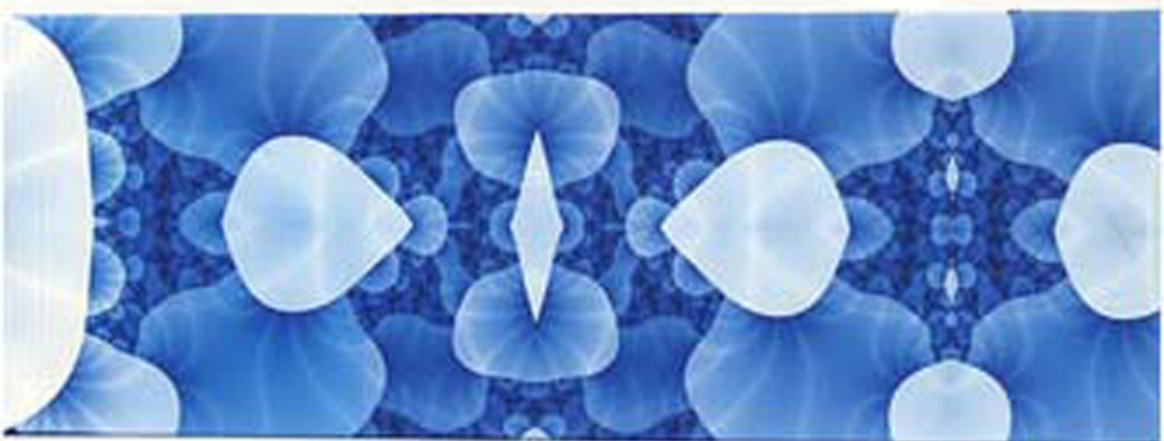




严歌苓·著

吴川是个黄女孩

吴川是个黄女孩

有个人想我。说是想得紧，想得不可终日。就在这个曾经屠宰业昌盛、血流成河、叫作芝加哥的大都市，走着一个想见我的人。唯恐天下不乱吗？关于芝加哥，丑闻已经够多。关于我的丑闻，也够多了。只是都很好地保存在我和另外一群人之间。用间谍术语，我和他们每个人是单线联系。因此无论丑闻怎样惊世骇俗，对方和我一样密藏。芝加哥雄性勃然的高楼，某一幢里住着一个想见我的人。故事从此就要不一样了吗？

想我的都是什么东西呢？是洗得干干净净、喷过古龙、精心剃了须的雄性肉体，在白色浴巾下，摊得新鲜平整。先是口舌和口舌的假话交流：好吗？——好极了，你呢？好得不能再好。上次做完感受不错？超级棒！我们开始？——当然。雌性肉体偶然也有，坦率买卖，我卖的是力气，她们买的是伺候。现在有了个想我想得要死的人，把我每天干五六遍的这桩事叫作“按摩”，我假模假式穿一身苹果绿和尚服，伪装之下的这个职业就给叫成了“按摩师”。伪装之下还有别的，男人们要这双玉手去宠惯他们一下。这时事情更简单，我和他都在局外，是这只纤纤秀手和那个器官之间的相处。完了事，我和他的关系毫无进展也毫无恶化。这是想我的那个人有所不知的。

我像个人一样走到街上，想着这个想见我的人。

信都在我的皮包里。皮包比别人的行李还重，就因为它必须盛装许多污七八糟的东西。比如信、账单、化妆盒、日记本。信是最重的一部分。信的啰嗦都是关于一件事：请求我去看这个想我的人。因为信如此的啰嗦，我越来越冷下心来。

写信的人在香港，叫作黎若纳，今年六十岁差三个月。是这样，黎若纳在二十六年前把一场狗男女关系纠正过来，第二次为人妻，什么也没带就走了。她带的东西只有几个相框和一个相簿。她连自制的内裤也没带。她落下的东西很多：金项链、旧皮鞋、一大堆丝绸缝的旧内裤，我。于是，我知道我和旧内裤一样不值得她带走。旧内裤和我都是她另一段私生活的证据。

我的外婆问七岁的我：“黎若纳是谁？”直到有一天她问完后我反问：“黎若纳是谁？”她才放心，不再问了。这年我九岁。肃清黎若纳留下的记忆和影响，外婆觉得是她一生中最成功的业绩。她就像子宫里从来没住过那个女胎儿，两腿间从来没钻出那个带一大堆黑胎发的标致女婴似的，再也不说、不骂、不伤心了。除了她看见我身上的烧伤疤痕，看见我跟在别人母亲后面学织毛线、擀饺子皮，她会把我拖到一边，搂一会，手在我背上或者头上细碎地打着，脱口出来一句：“毒啊……”她指什么，你马上明白了。她一直在想什么，你也明白了。如果不走运，一个星期会收到黎若纳三封信。如此的没用，还会拆开它们，一个字一个字地让黎若纳尽情啰嗦。这些字外婆看都不看就会说：“臭不要脸。”她说：“不要那样笑，就和臭不要脸的一式一样！”她说：“再敢那样走路——黎若纳就像你这样走的，走到哪，现世到哪！”我从此不能真笑，不能用真嗓音说话，不然黎若纳就得逞了，在我身上得到了永生。谁有这样的牙齿、头发、嘴角、眼神呢？它们是黎若纳的，它们要风流地顾盼、搔首弄姿，你说我拿它们怎么办？七岁的我唱了个什么歌，一句词说：“……天下无敌！”外婆说：“想得美，谁无敌你也有敌。你的敌人叫黎若纳。”我走在芝加哥一家花旗银行门口，体内附着这样一个大敌黎若纳。银行已关门。没有关系，我习惯什么都对我关上门。我的脸在自动存取款机的镜子里出来了，这个光线里谁都是丑闻中的人物。手还年轻吧？豆蔻年华的十指，把五张支票装进信封。因为提供了特别服务，支票面额都不小。八十，一百。这双年轻的手可是太知道枪匪横行的芝加哥有多少孤独的雄性人口。他们出高

价让这双手去蹂躏他们。他们发出腐烂的呻吟，渐入佳境，登峰造极。这双手和他们，也不知谁糟蹋了谁。我后面这张面孔能想象这双手刚去过哪里吗？又来了一个人，一看就知道是来私藏来路不妙的收入。机器响了，吸噬着我的五张支票。然后是那条黑暗幽长的秘密途径，它们得摸着黑走完它，走出尽头便洁净如新生。我转过身，在后面两个排队人眼里做一瞬的良家妇女。

芝加哥一眨眼成了鬼城。秋天的夜晚八点，金融区的摩天大厦噩梦一般逼近来，所有的正经人都鬼祟了，躲闪着，走得贼一样快，所有的反派们大摇大摆，枪手们醒来了，暗娼们容光焕发，酒鬼们摩拳擦掌。刹那间他们成了城市的占领军。我的步子不快不慢，他们假如有好戏唱，至少有我这一个观众。连麦当劳也开起乞丐 Party 来了。我买了一份鸡沙拉，鸡是前天的，生菜是昨天的。要背叛黎若纳，就要吃垃圾。外婆对事情的理解是这样，嘴馋的女人浑身都馋，眼馋、手馋、身子馋。黎若纳和人进行狗男女事务，开端就在一家蛋糕店。黎若纳有一副精美的口味，无美食、毋宁死。外婆的进化论：偷嘴、偷东西、偷人。

地铁站门口，乞丐气味充胀到鼻腔和脑子里。乞丐们大概因为活得毫无进展，所以生命淤滞成一股腐败气。不去躲闪他们阴冷的眼睛，他们就输了。非乞丐们像亏欠他们似的抬不起头，咕哝一声：对不起，没有零钱，然后通奸者一样溜得飞快。我从来不给乞丐钱，因为黎若纳总是给。黎若纳总是要“行行好”的，她该对她的丈夫和被她生到世上来的人“行行好”。她“行行好”是缺乏主次的，对蛋糕店里的陌生男人大大地行好。我还能看见那个黎若纳，三十岁，红色蜡染衬衫，白喇叭裤，招摇撞骗的本钱足够。你能想象不？这样一个女人能背着丈夫、女儿买一块奶油蛋糕，在店里就吃下去。所以没有艳遇蛋糕店也是她的福地。靠陈列窗有三张小桌，六把椅子，她没有座位、站着也是一样吃，一样不露寒伧，秀雅闲逸地吃，眼睛漫不经心地看着外面，为自己放哨。某一天她不是一个人了。刚刚在柜台前站定，在各种如花

似玉的奶油面前发情，一个男人说：“其实最高级的是牛油清蛋糕。”黎若纳一回头，好了，她的口福艳福都来了。黎若纳直觉特别好，一看就知道这个一无用场的人是金子堆大的。我现在能想象他们，马上配对，像一支筷子找着了另一支筷子。男人那低调的高贵，那积累了一切有关享乐的智慧的眼睛，那对一切不懂享乐的人的轻蔑笑纹，使黎若纳摇身一变，成了个无家累、未生育的女郎。男人把她带上楼。楼上是黎若纳的天堂。男人一定要给她高等教育：许多高贵的美食，外貌是不花哨的，比如牛油清蛋糕。黎若纳太识货了，和我父亲过日子错过了让她显露她享乐的才华的机会。机会来了。叫作吴岱的男人不久就发现了她美丽的丝内裤是她自制的。为了她那双贪馋的眼睛，黎若纳自染、自裁、自制衣服、裙子、乳罩。一万个人里，你一眼就能把她找出来。她没有一件衣服合身，要么过分宽大，要么过分窄小，合身的衣服多平庸。她看见一切常规的东西就不耐烦。我那时六岁，二十多年后我闭上眼能看见黎若纳背着我们出去造孽的模样：形象蛮大家子气的风骚女郎。

地铁经过一个站台。我看见站名了。黎若纳啰嗦到了把地铁站名都标在信上。这个站上去，有一座二十六层的公寓。等等，让我想想，是什么颜色？是浅米色的。门口站着守夜人，穿黑制服，对过有个咖啡店，从那里就可以看见五层楼上的一个窗口。窗口有隐约的钢琴声出来，是那个想见我的人弹的。黎若纳用圆珠笔费了多少口舌？生怕我还有新的借口，她把路线从地铁站一直标到了五层楼上：出了电梯有个长几，上面放了一盆假花，往它左边拐进一条走廊。然后就容易找门牌号了。

那个楼我不陌生。我和四楼的一个男人也有丑闻。我一两个星期就去他那里一次。有两次我在楼下的厅里坐了很久，想在暗里看看想见我的那个人。应该不难认，楼里没有几个亚洲人。我的伏击不成功，我也没听见什么隐约的钢琴声。黎若纳想得美，谁会在美国这种地方没事弹肖邦、舒伯特、李斯特？年轻人有多少好事可干？谁会干弹小夜

曲这样的酸事？伏击之后我回到家，开了淋浴，想起没拿浴巾。取换洗衣服时，一只手还在翻找，另一只手已经去关抽屉。煮开水泡面，不是把面拿到灶前，而是端了一锅滚水去柜子前取面条。一连几天，天天行为倒错。

十月是个好月份，芝加哥的叶子血红血红。它好还好在黎若纳停止啰嗦了。

茹比四十岁时，成了一个艺术学院的旁听生。我在她学校地下室里看见她，也把头发染得不成体统。她约我来吃她们大学生的便宜自助餐。我们是很无望的。她是同性恋，我连异性恋都不是。我急切地要找个男人搭伙过活，我干的这行又妨碍建立对他们的尊重意识。男女之间的初期假象，也丝毫建立不起来。茹比在郊区上班，常常采一把野花放在我家门口。她知道我们之间的无望，不过她总得有个人可以为其采采花——尤其是为采花她必须犯法。牺牲意识让茹比感到古典。

交钱的队比取食物的队要长很多。学生们没有一文现钱，三块钱也开支票：出示身份证，填写地址电话，这样队伍就排到了走廊里。我到餐厅的另一头去排取食的队。餐厅中间放的电影画面暴烈。情爱是件暴烈的事。学生们多数戴着耳机，相互间大声交谈。这个年纪同时能干好多件事。一个亚洲女孩也可以同时看电影、听音乐、和人交谈。她或许也和这一大片美国孩子一样，同时干的每件事都是干了就忘，没一件算数。

亚洲女孩比所有学生更邋遢，牛仔裤和上衣都叫不出颜色，是所有含混颜色的混合。头发真多，可供她去染三个色调的黄。我心里说：转过你的脸来。脸还真转过来了。由于衣服和头发的似是而非，衬得她的脸惊人的清爽。原来什么都是伪装：她既不野也不匪，她是披着狼皮的羔羊。那样舔舔嘴唇，十足的嘤小妹。笑起来她总是手背一提，好像要去挡她不太齐的牙。我仇恨自己这个动作，却是每回笑完才醒悟到。有什么可挡呢？我们没有美国孩子那样齐得恐怖的牙齿，也就

没有他们的塑料笑容。亚洲女孩竟然也有向后翘的小腿，脚在后面，人挺到前面去了。我就明智，从来不穿太紧的牛仔裤。黎若纳毫不顾忌，一双那样的小腿也愁不住她，照样喇叭裤、短裙子。

亚洲女孩忽然感到我在盯她。她把脸转向我的那一刹那，我把头调开了。她大概觉得让一个三十来岁的女人盯比让男人盯可怕多了。我和她这个游戏便玩了起来。只要她回头，我就转脸。她的动作、神情太优美太多情了。让人想入非非的一个女孩。她一甩头发，多有看头啊！我在给人按摩时，这样一甩头发，男人们会突然走一走神。很多很多的头发，很有质感分量的头发，才能让她和我甩得这样倜傥。我自恋是没错的了。我迷恋这个亚洲女孩，因为她身上有我。

不对，她身上的那些多情优美、风流媚气明明是黎若纳。我背上的汗毛“刷”的一下全部竖立。

茹比付了钱过来，我已让过十来个人去我前头取食了。茹比在白种女人中算漂亮的吗？太近了，我早已失去了判断力。她很强烈，眼神、姿态、话语，都强烈得让人吃不消。我把托盘往角落里端，我可以待在暗地，让亚洲女孩在明处。

茹比吃了两口就停下刀叉说：“你他妈的在和另一个人一块吃饭。”

我说：“谁？”

她说：“是谁无所谓，反正你不在和我一块吃饭。”

我嬉皮笑脸：“男孩子们太让人心乱了，茹比，谁让你把我带到这里来？”

其实我还在毛骨悚然。

“我的教授是个挺帅的白痴，我要是个姑娘就和他来个一夜情。”茹比说，“要不要给你们介绍？”茹比强烈的灰眼睛看着我。

我皮很厚地说：“好啊。不过一夜情还费什么事介绍？”

茹比突然站起来，走了。茹比知道我旗帜鲜明，不和女人腻歪。她从来没给我得罪成这样。她找上来要我伤害她，我有什么办法？本来

我想把亚洲女孩指给她看，话一讲出口变了。一顿廉价自助餐直接成了残局。

我放下塑料刀叉，无趣极了。连个假戏真做的献花者也没了。我拿起皮包、外衣。茹比突然高大地又冒出来，在长条餐桌对过。她指着身边的络腮胡子男子，看着我：“怎么样？”

我以为我干那桩勾当干得不会脸红了。我把手伸过去，合在他伸过来的手上。络腮胡子把他的嘴唇烘托得艳丽无比。茹比坐下去，狂吃起来。黑胡子和艳红的嘴唇里是天然的牙齿，谢天谢地。因此笑容不像模子里倒出来的，虽然生硬、干燥。我想集中精力来施展一下魅力，眼睛不当心又溜到另一张桌去了。我看着二十岁的自己，那个百分之四十的侧影在丰茂的伪金发中。应该说，是看着二十岁的黎若纳。我的父亲就在我这个角度欣赏她吗？黎若纳是个让男人一看就心里打鼓的女人。他们一面想，祸水祸水，一面就蹚了进去，谁也拦不住。

我一面吃，一面和络腮胡子打情骂俏，同时盯亚洲女孩的梢。同时做三件事，前两件都不算数。我说：“洛伦教授你和弗洛伊德长得一样。”他说不止你一人这样认为，他以为我说的话算数。他说：“茹比说你是舞蹈物理学博士。”我说：“茹比夸大了，我半途而废。不过舞蹈物理学无论如何都是废。”他说：“没错，和文学写作一样，早学成早废，晚学成晚废。”

他又把我的话当真了。他应该反驳一下，说：真是个有趣的学科！可他说：“你看，我就这么废人子弟。”

亚洲女孩是修什么学科的？有钱该修废人子弟的学科。亚洲女孩站起来，又去排队拿吃的。她拿了烤小排、煎鱼块回来。廉价自助餐里这两种最上档次。贪嘴的女孩。这个国家她算来对了，谁也不懂贪嘴是古典的羞耻。我接过洛伦教授的名片，看了一眼。他叫佳士瓦。我不得不给他一张名片，但愿他不需要局部的特殊按摩。他要走了，手还得给他。他握住它，这回握得不干不净了。你以为它只是只纤维素

手？那样一握就酥在你手里了？

手放开我，他眼睛一垂。这是个少见的细腻人物呢。他已明白握手时他走得远了点。一个缺乏廉耻的环球、时代，我碰见了一个羞耻心未泯的佳士瓦。我刹那间收回神志，目送他走进人群。

茹比一会也不让我纯情，问我：“一夜还是两夜？”

我说：“你还有点眼力。他不是白痴。”

茹比说：“读读他写的小说你再发言吧。”

我已经把佳士瓦忘了，看着亚洲女孩吃得面若桃花。一个男人请她去吃海鲜大餐的话，她也就跟了他跑了。我在外婆严酷的训导下，终于培养出不贪馋的次要美德。所以男人们少了一件讨我好的事可做。

茹比去上课之后，我取消了下午的两个预约。在街上瞎逛。外婆的米缸是一座矿，能挖出金项链、翠戒指、玉手镯和一扎用丝带捆住的信。翠戒指是爸给黎若纳的。他的继母去世，把这个翠戒指给了爸。玉手镯是爸攒钱给黎若纳买的。他们刚结婚他就答应给她买。黎若纳在旧货店看见一个玉手镯就成了个耍赖的小女孩，拽不动推不动。爸答应她一有钱就给她买。那钱爸在二十年后才有。外婆成了只老狗，在米缸里刨啊刨，把宝贝一件件埋进去。黎若纳出走的第二天，外婆管爸叫“我儿”，叫我管她叫“奶奶”。三人的关系就这么不伦不类地定下了，三年后爸带了个女人给外婆看，外婆立刻倒下，说是心脏病猝发。外婆犯心脏病是杀手锏，爸一有女人她就拿出来。

芝加哥的秋天夜晚最合我意，地上落叶让风带着滚动，沙啦啦啦。一本正经的人散光了，不三不四的人们把气氛弄得莫测，并有一点浪漫。所有灰暗的人影都在毒品和酒精的作用下行动。我怕谁呢？黎若纳把我和她的旧内裤一块扔了，谁还会要我的性命？楼是正派人的楼，五楼的窗子突然有了钢琴声。我出了电梯，面对长几和假花。假花后面有面镜子，我看见亚洲女孩的神色附在我脸上。来这无非是我太好奇了。好奇得我不去赚下午的两张支票。

我按了一下门铃。一定不会马上有人来开。最好别开，我已经没好奇心了。门一开，我们全都没了退路。黎若纳就得到了救赎。

门却开得很快。果然是她。她的娇嗔原形毕露了：一身乳黄色室内服，背上一个小帽子——她像个吃母乳吃到二十岁的孩子。我说：“咳！”

她已经认出我是谁了。用英文说：“难怪！今天在学校是你吗？”

我说：“你说呢？”我坚持用我标准的中国话。

她把我请进屋。我道歉自己做了不速之客，应该先打电话来。她问我什么时候得到她的电话号码的。我说有一阵了。她用英文，我用中文，说着进了她的客厅。她为客厅的凌乱向我赔不是。我看出凌乱是伪装的，她用凌乱经营出一个可心的小窝。杂志上剪下的画页都颠三倒四地贴着，地上一大蓬红枫叶插在粗糙的铁皮桶里，全是别有用心的。二十一岁已经是个打扮的老手，遇到什么，打扮什么。黎若纳穿不合体的衣服，让人过目不忘。

她叫我坐在地上的蒲团上。她不用沙发这样平庸的家具。

“不坐了，我马上还有事。”

她说：“是吗？”

我已经明白了。她没有想念我。什么都是黎若纳的操办。外婆把黎若纳的信放在米箱里，她以为这样就当了爸的家，爸就不想念黎若纳了。

我嘴上说：“早想来看你，一直都抽不出工夫。”

她说：“是嘛？”

她这句话有点惹我恼火。好像说：谁相信呀？这年头同父同母的亲姐妹都嫌多余。

她冷淡，别有情致的冷淡。黎若纳说她想我想得上火。太滑稽了。我信以为真地认为这个城市有个想我的人。我中了计。黎若纳无非想让我和她相互监视。或者她觉得她二十一岁的女儿在凶险的芝加哥得有个保护人兼保姆，于是我就光荣入选。她问我想不想喝口热的，

茶或咖啡。我说我马上要走了，不耽误她时间了，大概她功课很紧。她说那好吧，下次吧。你看，她就这个态度，来也行，走也好，都随我便。这个叫吴川的女孩。

我问她功课多不多。她说比在香港时好些。我又问她喜不喜欢她的选课。她耸耸肩。她全无所谓。我的谈话欲望给她的无所谓刺激起来，说我刚才听她弹钢琴了。她两眼一瞪，问我：“什么时候？”

我说上楼之前。

她说她已经一个月没开过钢琴盖子了。

我的自作多情原来可以导致美妙的琴声。我说那我听见的大概是你楼上或者楼下的人弹的琴。她说不可能，这种防噪音的窗子怎么可能把琴声从几层楼上漏到马路上呢？太好了。从这一点上看，吴川也是黎若纳，不懂人情世故，不知给人搭台阶让人下台。

厨房突然响起一声哨音。她跑出去，回来时端了一杯茶，不卑不亢往我面前一放。她什么时候去烧的水？我一进门她就打算请我喝茶？我说既然茶也烧好了，我就坐会。她脸容毫不因此改动丝毫。她问我习惯坐蒲团吗？她特别讨厌沙发和椅子。她从小干什么都在地上。那也是一种豪华，不是什么人都有福气把桌子、沙发、床延伸成整个地面的。至少地面得有资格去当桌子、沙发。它至少得够干净，或者够柔软。那个金子堆大的老少爷惯使着母女俩别出心裁。

吴川问我吃过晚饭没有。我说不饿。她说那么一顿自助餐，大概是不会饿。我想那她问我吃晚饭没有干什么呢？她把一盘自烤的通心粉放在我面前。吃不吃自便，她无所谓。通心粉是刚从烤箱里拿出来的。烧茶时她已经把它热上了。我毫无胃口，做出的热情让她看了出来。她说不饿就不必吃，她明天可以当午饭。我问她自己吃过晚饭没有。她叫我不必管她，她随时都吃得下去。

冷场总是发生。她不懂冷场在这样的划时代相见中不可以频繁出现，因为哪一个冷场都可能导致终结。我在一个再也救不起的冷场中站起来，说：“哎呀，得走了，不然要迟到了。”她眼里露出莫名其妙

来,好像说:并没有挽留你呀,你早就可以走的。

“哪天我请你出去吃饭。”我走到门口时说。

吴川笑一下,说:“好啊。”她没有说:“你有空再来我这吧。”也没有问:“你家住在哪里?”

我又是一阵无趣。她没等我走到假花就关上了门。我不会再来这里了。

风打起哨来。芝加哥一夜间变色,一派铁青,树叶落完的枝干瘦削而锋利。我的生意红火,男人们在铁青色的大都市渴望温情。最丑陋、低下的温情,一百元可以买到。吴川的手连钢琴键也不屑于摸。手得好好洗,恶狠狠地搓上洗手液,一遍、两遍、三遍。不祥的芝加哥初冬,人们都胡乱约会,只要不是独处就好。两个人打电话给我,佳士瓦和吴川。吴川只是要把我落在她家的丝巾还给我。佳士瓦说他有两张舞剧票,他的伴黄了,一张票多余下来。他本来准备去剧场门口卖掉它,但他不愿和一个陌生人挨着坐。我说谢谢了,很荣幸他不把我当陌生人。他说顺便一块吃晚饭。我说那就在他学校附近选一家。因为我必须从吴川那里拿回我的丝巾。

晚餐时我粉墨登场。佳士瓦把我提拔成“非陌生人”,我得领情。选了一条黑裙子。这是我第一次买不减价的衣服。没什么新鲜想法,穿黑色总混得过去。佳士瓦在门口抽烟。他又让我心动一下:抽烟的男人现在是物以稀为贵。蜡烛、鲜花、音乐,餐馆的人全是窃窃私语。今晚他想走多远?脱下大衣后,我说我一会要出去等一个人。他说叫那人到里面来,也一块喝一杯。我说约好在门口,只拿一件东西,她就走。佳士瓦故作俏皮:“是‘她’?那我放心了。”

一杯酒下肚,我们放肆了不少。可以把罪责推到酒上。我站起来,向侍者要我的大衣。佳士瓦也要他的大衣。我说他何必去风里陪冻一场?他说是吗,在刮风?和你在一块怎么不觉得呀?要没有酒,这种初级殷勤比较倒我胃口。我还是不要他和我一道出去。他说他得确定一下,我等的那个人的确是个“她”。我把大衣还给侍者,说好吧,我打电

话叫她进来吧。我们重新坐下来，都有点累。我赶紧倒酒。喝了酒会不把许多事看穿，或者看穿也不要紧。我和佳士瓦眉来眼去，脚不老实了，在桌布下碰上也不躲开。我怕什么呢？怕佳士瓦相上吴川？他比吴川大十六岁，别逗了。吴川比我优越？当然。二十一岁的白痴都比我优越，何况吴川不是白痴。我的确怕，这我得认账，我怕吴川向佳士瓦展示一个纯情、青春的我。一个二十一岁的我，没经历过遗弃，没让一大锅汤烫伤过，没有在游泳池边吸引过许多残酷的追询目光。佳士瓦马上会比出优、劣，任何男人看见了原版就不再会要残品。我的嫉妒心毒辣起来：吴川拥有的太多了，劫走了属于我的太多了！

我把电话拨通。吴川淡淡的的声音出来了：“你这就出来吗？”她吃准是我打的电话，“哈罗”都免了。我告诉她，到了餐馆门口，往里走，走到右后角。她说好的。我想，佳士瓦假如对吴川显露出兴趣，我和他就从“非陌生人”降一级。这个大都市“非陌生人”是最正常普遍流行的关系，连我和吴川都是这种关系，大家余地留得大着呢，缺了谁也不会受不了。

刚放下电话，吴川已站在我面前。身上一股刺鼻的寒气。她在餐馆门口站了至少十分钟。我说你早来了干吗不进来？她只是平淡地把我的丝巾放在我的椅背上，说：“不太冷。”她手在大背包里摸。我说：“把包拿下来，坐会，想吃点什么？”她把手从脖子后面一抽，我看见一条暗金的弧光。非常古雅的一条长纱巾，自来旧，金色很含蓄、暧昧，掺了旧旧的秋香色和锈色。变色龙似的，从哪个光调看它都让你小小地意外。

“你要吗？”吴川问我。

她的样子是随时准备我不要的。

“很漂亮！”我说。“那给你吧。”她也是漫不经心地把它往我的椅背上一搭。我谢了她，她像没听见。叫她坐下吃点什么，她说她下面还有一节课，得马上回课堂去。再转过头，她小小的人儿已经给她的大背包挡住了。本想给佳士瓦和她介绍一下，她连嘴都没让我插上。

“很漂亮。”佳士瓦说。

“丝巾还是女孩？”我问。

“你妹妹和丝巾都很漂亮。”

“你怎么知道她是我妹妹？”

“到厨房里把那个意大利老厨子拉出来——他视力只有零点一，是靠手感和嗅觉烹饪——他一眼也看得出你们是姐妹俩。”佳士瓦说。

“不过我是她的下脚料做的。”

“不过我先见到你的，先入为主。”

我把丝巾拿过来。崭新的气味、质感。吴川把它随便往背包里一揉，和她乱七八糟的书、笔、绒衣塞作一团。她是真不经心，还是存心要减低送我礼物的生硬和隆重而故作不经心呢？她为了来见我，早就跑到餐厅门口了，在冷风里站了那么久。她今天下午去了 Marshfield 还是 Blooming-dale，花多少心思和时间选了这条长丝巾？她一定觉得我原有的那条太凑合，她认为我应该配更华贵的东西。黎若纳借这个二十一岁的吴川来评判我的审美格调，借吴川的手来操办我的形象设计。如此而已。所不合逻辑的是她巴巴地等在芝加哥的餐厅门外受冻。

主菜来了的时候我们已经不能从容地吃了。佳士瓦不断看表。我们因为谈到我的童年而不断停下咀嚼。我讲的是我和父亲、外婆的生活。它让我讲成了一段充满阳光的日子。所有的悲剧细节都是自我解嘲。这就是黎若纳在一次次怀孕、一次次流产，最终留住了吴川的那段岁月。我告诉佳士瓦，外婆买了五只螃蟹，也养在米缸里。米缸可以养肥螃蟹，能从头年秋天养到来年春天，这样过春节就能吃上新鲜螃蟹。螃蟹全钻到了米缸底下，外婆用手去刨，手指被钳住。我解救外婆时，发现了一扎扎的信，大部分是给爸的，一小部分是给我的。黎若纳多的是时间，用写信消磨。

“说明你母亲还是爱你的。也爱你父亲。”佳士瓦说。

“她很滥情。反正她有的是感情。她不相信有人会不要她的感情。”

“你妹妹大概是个最幸福的女孩。”

“大概。”

我们起身，佳士瓦为我穿大衣。他把新的长丝巾挂在我的脖子上。他钟情于吴川的选择。黎若纳一次要从香港回来看我。十七岁的我对同病室的人说：我妈星期五来看我。第二个星期五，我还是坐在医院的花园里等，怕探视时间过了，黎若纳给挡在楼下。一个二十五岁的病友很久没下过床，被捆绑在大小橡皮管子和支架中。她从鼻子里插的氧气管里对我笑，问我见到我妈没有。我告诉她我妈下星期五一定来，这星期她没买到从香港飞此地的机票。第三个星期五，二十五岁的女病友问香港的机票买到没有。她已经不再为我望眼欲穿，她已经在等待我的谎言破产。她是一个女军官，天天有男女老少众星捧月地围在她床边。第四个星期五，黎若纳把电话打到护士值班室，说她下星期肯定来。第五个星期四夜里，二十五岁的女病友死了。黎若纳还是没来。黎若纳造的孽可真够深重，二十五岁的一条生命都在我的等待中耗尽。谅她也没脸皮再打电话来。爸说她已到达，突然收到香港急电又返回了香港。黄胆肝炎造成轻度肝腹水的我还远远没有成为黎若纳的急事。爸从此天天下午来医院。违反医院规矩，他不管，他的探视要抵上双份。半年后，爸带着康复的我去了邮局，在隔音室里的咆哮连外面的人都听得见。他说黎若纳抛弃一个孩子一次够了，不必再来第二次、第三次。五个星期五，一个女孩经历了五次抛弃。隔音室的门开了，黎若纳要和我说话。我摇摇头。这样多累？那五个星期五，黎若纳把大家都累得够呛。把她自己也累着了。我可累不起了，连上楼梯都得爸背。隔音室的门又关了。爸还在张牙舞爪，口沫横飞。手突然停在半空中，听到那头有句令他意外的话。我没问他听到什么样的无赖借口，随黎若纳去编瞎话吧。她的借口打动了爸。她的借口一向打动爸，也只能打动他。外婆去世前，叫我把米缸里的

信全烧掉。她说：“你要信了那些信上的花言巧语，就脱下衣服看看你身上的疤。看她怎么把你弄成了个‘花人’。”

我看着舞台上的吉赛尔幽灵，怎么会有人把忧郁和感伤用肢体表白得这样好？语词是及不上的。语词表白忧郁和伤感都那么不得体，那么矫揉造作。我的右手被试试探探地拉住了。要是告诉了佳士瓦这右手的功用，他会不会还拉它？这是一只掌握着许多人糜烂享乐的手，它在操纵出一声紧一声的糜烂呻吟时只有一个热望：毁了进入到这手心里来的东西。现在佳士瓦把他的手也交了进来。我该告诉他它冷酷而凶残，只想毁掉进入它掌握的东西。任何东西。

星期六晚上，我到吴川的公寓楼下接她。我邀请她吃螃蟹大餐。到了六点，她还没下来。我把车停进附近的收费停车场，上楼去了。她在家，就是不接电话。原因是有的，一个艺术学院的男生和她在一起。螃蟹大餐有了第二个客人。餐中，头上包着义和团头巾的白种男生和我谈起伊拉克战争来。他让我意外：所有艺术学院的师生都仇恨布什的保皇党，他竟然是个战争支持者。理论是这样：动不动就斩人首的民族该灭绝。戴义和团头巾的小纳粹想挑起一场论战。我可不想累着自己，说他的理论有一部分道理。他问我哪一部分。我说一大部分。他搂了吴川一下，庆贺我对他的认同。

“我很愿意和你这样的人谈话，”他说。为他的纳粹理论队伍拉到一名壮丁，他觉得今晚赏光来吃饭吃对了。“你一看就有思想，很有力量的性格。”

“你也是。”我随口胡扯。管它呢，好话便宜得很。

吴川插嘴了：“你觉得他怎么样？”她用中国话问我。眼神把我弄成了家长。

“还不错。这要你自己多了解才行。”我说，“什么时候认识的？一个礼拜有没有？”我笑得很慈祥。

“我们认识有半个学期了。他是文学系的。”

我连吴川是什么系都不知道。我做了个眼色，叫她别讲中文，让

小纳粹不舒服。小纳粹看出来，笑着说他一点也没有不舒服。他不懂我们的谈话更利于他观察人的“非语言表达”。这是文学中最精华的东西：真的表达，往往在语言之外。他为显示自己的不平凡不乏味，故作偏执。他是个很聪明的人，那份聪明得兑上水，稀释稀释，就不会很腻人了。

吴川是倾心于他的。他说她肯定不敢在眉毛上穿洞，戴上眉环。吴川说那是因为她皮肤不好，爱发炎。他说得了吧。吴川说我们都是疤痕体质，她指我和她。小纳粹说那太可惜了，不然你会蛮酷的。

我很想跟吴川说：别理他。多好一张脸！去捅出乱七八糟的窟窿来，疯啦？我当然不会说，没人来问我的意见。并且现在的孩子们，只会在年长人的反对中得到激励。反对越猛烈，他们越义无反顾。

“你说呢？”吴川问我。她手上出现了一面小镜子，自己用手在眉毛上捏弄。“这里戴一个银耳环，你说怎么样？”她眼睛从镜子后面升上来，严峻地看看我。

“你不是疤痕体质了？”我半认真半玩笑。

“我不知道。妈妈说你是，所以我想我也是。”

看看，黎若纳把这个小人儿完完整整地保存了二十一年。一块破碎、一条裂纹也没有。难怪那样心急火燎，一封信啰嗦五张纸，要我替她看管这个小人儿。要我和小纳粹这样的男生们奋战、争夺她。我那见不得的身体，那浮雕一样的疤痕。黎若纳和老花花公子吴岱野得魂也没了，把一锅烧滚的汤放在我的玩具柜沿上。爸听见一声惨号从里屋出来。他的女儿只有后背没了前胸。七岁的我成了只剥皮兔子，躺在急诊床上，惨叫把陌生人的眼泪都引了出来。黎若纳没有因为她的痛悔而收心。她还是走了。连我植皮手术的最后结果也没顾上看，就和吴岱去蜜月了。

吴川对自己的冰清玉洁、无痕无疤不耐烦了，迫不及待地催问我：“你真的认为我眉毛上戴个环好看？”

我本来想说：“嘿，你别把我扯进去，我不负这个责！”可话到嘴